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

THE AESTHETICS
OF THE POST-MODERN CITY

Zhou Ying

后现代城市美学

周 膺 /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

后现代城市美学

周 膺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现代城市美学 / 周膺著. —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80170-836-6

I. 后… II. 周… III. 城市学: 美学—研究 IV. B83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74270号

后现代城市美学

著 者 周 膺

责任编辑 陈立旭

装帧设计 周 膺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8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66572157 66572281

印 刷 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数 17.25

字 数 350千字

版 次 2009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70-836-6/B.48

定 价 5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序 言 对城市的治疗与美的设计	1
第 1 章 后现代状况下的城市与城市美学	5
一、现代、前现代与城市美学	5
二、后现代之作为城市美学的存在基础	17
三、后现代城市美学的创建与城市美学的再构	28
第 2 章 后现代城市美学的时间建构	49
一、存在性时间中的城市与城市美学	49
二、流动时间与幻象城市	59
三、闲暇时间与自由城市	62
第 3 章 后现代城市美学的空间建构	67
一、时间空间化状态下的城市审美化趋向	67
二、脱域机制与漂浮的场所	72
三、虚幻空间与体验城市	77
四、碎裂空间与紧缩城市	85
第 4 章 后现代城市美学的存在性建构	89
一、城市审美主体的解构与被构	89
二、欲望消费与欲望化写作	97
三、戏仿与游戏城市	102
四、城市故事	110

第 5 章 后现代城市美学的语言解构与书写模式	117
一、新符号学与城市美学符号的解构	117
二、新解释学与城市的历史性理解	121
三、知识考古学与城市历史的解构	125
四、多重解构的游戏与城市书写	133
第 6 章 后现代城市美学的伦理视域	139
一、市民社会与城市权力系谱学	139
二、媒介与城市美学交往实践	145
三、人域同构与自性之美	151
四、杂交与文化身份	158
第 7 章 后现代城市的生态美学	165
一、基础重构与超越逻各斯中心主义	165
二、自然的返魅与灵活自然主义	170
三、深生态学与后现代城市的伦理取向	174
四、设计遵从自然	179
第 8 章 后现代城市的美学经济	185
一、消费革命与城市文化资本	185
二、演化经济学与生物学隐喻	190
三、美学经济与梦想城市	195
四、创意经济与创意城市	199
第 9 章 后现代城市美学的理论建构	205
一、整体有机论美学	205
二、后现代城市美学中的审美关系	210
三、后现代城市美学的范畴系统	222
第 10 章 后现代城市美学与城市形态设计	233
一、城市之魅与城市形态	233
二、城市美学设计导则	237
三、城市形态的社会选择	242
四、“精灵模型”及其他	247
主要参考文献	251

序 言 对城市的治疗与美的设计

100多年前，在英国人大规模开辟现代城市建设战场的当口，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即尖锐地指出，城市是生长在我们这个美丽岛屿之上的疮疤。岂止英伦岛国，这100多年来，城市疮疤也开遍了整个美丽世界。现代城市是一种人类生存模式，也是一种美学巨构，曾经为人类带来自信、效率与福利，但它的好处正被种种“欲望制造”抵消殆尽——已然成为“国王的新衣”或柏拉图的洞穴。现代城市在扩大居住规模、提高生产效率等方面具有较好效用，但自其产生起，人性异化、环境恶化等问题便相伴而生。发达城市早期发生过的“焦炭城”现象几乎在所有后发城市重演，而发达城市反人性、反自然的“城市病”在当今仍然是难以治愈的顽症。“城市病”历来既有，由于古代社会商品流通量较小，再加上环境污染源较少，客观上减少了城市环境破坏的风险，而在利益机制极大强化的今天，城市环境问题变得十分严峻，使现代城市的繁荣演化为一场巨大的灾变。从表观上看，现代城市发展也正在日益变成一种丑化运动。其结果是使得人类与栖居愈发遥远，使得自然的生理平衡机制遭受有史以来最为巨大、很大程度上不可逆的严重破坏。就这方面批判来说，如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们的解构主义，不管如何极端、如何偏执、如何尖锐都不为过。就我的游历所见，世界上几乎不存在说得上比较完美的城市。北欧和澳洲的一些城市或城镇状况比其他地方要好些，尤其是小城镇的自然环境破坏较小。北欧城市堪称世界的典范，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直在构建花园型国家。但所有城市由

人口和产业集聚引发的矛盾仍然越来越多。尽管澳大利亚、新西兰政府一直奉行限制工业发展的策略，澳大利亚以畜牧业、旅游业和采矿业为主业，新西兰还少了采矿业，但即便有十分强大的政府和民众保护体系，保护资源这道防线也变得越来越脆弱。悉尼、奥克兰的构造即已变得十分牵强。从各种间接的信息资料分析，也许在我见识的范围以外也不存在完美的城市。我在2001年出版的《现代城市美学》一书中曾言说过这种无奈：城市是人类追求美好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历史结果。可是它却也如脱了缰绳的马一样难为人驾驭。当人口、设施、财富、信息不断扩充以后，城市的无节制发展也为人类所始料不及。在很大程度上，人类理性的发育跟不上城市的发展，致使城市问题层出不穷。

在这种情形下，后现代城市和后现代城市美学日益凸显于人类的思维图像之中。城市和建筑设计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策源地，而后现代城市美学自20世纪中叶以来逐渐发展为美学运动，并已经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潜在的理论体系，对当代城市学和城市设计实践影响深刻。后现代城市美学从解释学、解构学、生态学、未来学等方面对城市美学和城市设计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索，域界和深度大大超过传统城市美学或现代城市美学。其深刻的批判性激发了人类对城市问题的高度关注和改良的热情，而其批判方式又极大地拓展了人类对城市问题的思考和处置维度。后现代城市美学改变了人类单纯的技术性对待城市的“招法”，使城市学走上了一条比较完全的人文性与生态性相结合的思想道路。解释学城市美学观所强调的文本的历史性、可理解性、可交流性、可对话性以及意义的可生成性尽管在实践上缺乏贯彻深度，但已成为当代城市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构建城市意象、活力空间已是城市人普遍的美学和生活追求，城市的时间性存在因此有了新的发觉。解构学城市美学观所主张的反中心、反主体、反原则、反体系、反历史意义和不可表现性则是“治疗”“城市病”的猛药，它以“偏执”警醒工具理性支配下的城市人，使城市不再以均质的面貌而以“拼贴”的方式被再构。城市的空间性存在被前所未有地深度勘探，城市因此成为一种民主社会的选择，成为“公共的”城市。生态学城市美学观从城市文化重建的角度致力于建设“深生态学”，以此从物理上增加城市的“负熵”使其“新陈代谢”趋于可持续，从而构建能适度和自我节制发展、可再生的稳态城市。未来学城市美学观挑战人类在城市设计上的思维极限，使人类的城市美学理想与城市的合理性最大程度得以协调与实现。后现代城市美学是对现代城市设计和城市美学的解构，但其具有解构和建构双重特征，形成了独特的思想体系与实践模式。主要包括：解释学方面的意象论、可变化论、形态多样论、交往空间论等，解

构学方面的拼帖论、有机生长论、广普论等，生态学方面的新陈代谢论、仿生论、遵从自然论等，未来学方面的技术游牧论、比特论等。后现代城市美学也形成了独特的范畴系统，以游戏城市范畴系、栖居城市（存在空间）范畴系、拼贴城市（存在时间）范畴系、意象城市范畴系、生态城市范畴系为基本内涵。后现代城市美学的范畴系统体现了后现代城市的价值取向，其涉及面相当广阔，但焦点主要不集中在城市表观的形式美或功能价值，而是城市的存在性的美，强调审美的主体间性。

后现代城市没有像现代城市那样的预先设定好的完美图景，具有非确定性、整体性、相关性、动态性和目的性等特征，不可能用简单的工具理性设计完成，也不可能通过社会工程学来运作，而是人类持续不断的自我检视、批判和改良的成果，需要的不仅仅是理性支撑的政治责任与道德责任，因而是一种永远在途中的设计与建设。后现代城市美学认为，在人的“能动的”设计和建造之前，存在已然先行聚集于城市的一切“设计”之中，已然先行栖居于城市的所有“建造”之中，人与城市的关系是从根本上得到思考的栖居。后现代城市美学使祛魅的城市返魅。后现代城市美学反对主体论意义上的整体论，也反对还原论，但主张整体有机论，并谋划新的时间性、空间性和存在性。后现代城市美学强调审美的主体间性，在多主体、共主体、互主体的互动境域中“探询所有理解方式所共有的东西”，从而使审美成为一种主体间具有参与和分享的性质。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指出，在“我—它”关系中，我把一切存在者都视为外在于我的对象性客观存在，我根据我自己的立场、观点和需要对其予以认识，并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使其为我所用。而“我—你”范畴不是一种人之于世界的认识的、利用的关系范畴，而是一种超越这种关系范畴的“相遇”（Meeting）的关系范畴。在这种关系中，我不是把一切存在者都视为是外在于我的对象性存在，而是视为一种像我一样的超越对象性的主体性存在。所以，“当你被说出时言说者没有其对象之物……当你被说出时言说者一无所有；它实际上仅有虚无。但是他却处于关系之中。”在这里，显然一种以我为中心、以我为坐标原点的“透视性关系”已不复存在了。这种“我—你”关系体现为一种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交谈性的双边关系——这是后现代城市美学所要构建的基本关系。

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尽管许多发达城市已渐次进入后工业时代，但在发展模式选择和美学认识方面却未能摆脱现代城市观的窠臼。中国城市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后期，较发达城市正在进入后工业化社会。据估计，中国近二三十年的城市扩张规模和建筑物增加量超过有史以来的总和。工业化、城市化是一种历史宿命，无法回避，但我们也必须考虑做得节制些。仅仅出卖

劳动力和资源的工业化是城市的灾难；滥用资源、缺乏美学设计的城市是市民的灾祸。当前尽管执政者和市民有了一定程度的后工业或后现代意识，然而在城市建设的操作上却基本仍是现代的。建构一种长期发展的理念，并进行有效的制度安排，确保较为长远的环境主体的利益，控制短期的破坏性的环境利益，已经变得非常紧迫。设计和管理城市又是一项综合性极强的文化事业，所以提高全民尤其是城市执政者的文化素质也是当务之急。在后现代状况下，每一个市民都要做城市美的书写者、创造者、拥有者。

第1章 后现代状况下的城市与城市美学

一、现代、前现代与城市美学

“后现代”（Post-modern）是一个时间概念，它与“现代”（Modern）、前现代（Pre-modern）相对应。但是从时间意义上来说“后现代”却有其内在矛盾，因为动态的现时只能是“现代”，而不可能“后”现代。所以，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将后现代定义为：“最发达社会里的知识状态（Mood）”和“针对元叙事的怀疑态度”。¹利奥塔指出，后现代不是一个新时代，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对现代性自称拥有的一些特征的重写，首先是对现代性将其合法性建立在通过科学和技术解放人类的视野基础上的宣言的重写。”²这种重写意味着从科学、文学、艺术到社会规范等一系列文化与社会境遇中的“游戏规则的改变”，人类应当重新探寻“现代”科学认知、叙事话语、社会规范的转换与确认问题。利奥塔将这种转变称为“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变。利奥塔所指证的“后现代”实际是“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或“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同样的，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将“现代”理解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或一个时间概念。福柯指出：“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把现代性更多地看作是一种态度，而不是一段历史时期。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一种与现时性发生关联的模式，一种由某些人作出的自愿选择，总之，是一种

¹ 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84, P.xxiv.

²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5页。

思考、感觉乃至行为举止的方式，它处处体现出某种归属关系，并将自身表现为一项任务。无疑，它有点像是希腊人所说的精神气质（Ethos）。因此我认为，对我们来说，更有启示意义的不是致力于将‘现代’与‘前现代’或‘后现代’区分开来，而是努力探明现代性的态度如何自其形成伊始就处于与各种‘反现代性’态度的争战之中。”

¹米歇尔·福柯：
《什么是启蒙》，《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
第6期。

人们往往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地理大发现看作是现代性开始的标志，然而思想家却通常将18世纪的启蒙运动作为现代性的真正开端。因为在启蒙思想中，现代性的启蒙理想才正式被确立下来。现代性启蒙理想主要是由以卢梭为代表的法国启蒙思想和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思辨哲学共同奠基的，它确立了人文主义的历史进步意识和理性主义的批判精神，并以之为支撑牢固地建构了现代社会中人的主体性原则。这一主体性原则，经由笛卡尔开启的“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转向后，通过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而得以确立。福柯在分析“什么是启蒙”时指出，康德的批判哲学标志着“现代性”的开始。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道德意识和交往行为》的演讲中也指出，康德的思想给予我们对客观知识、道德实践和审美判断等三个领域在观念上的可信性和能力。

在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位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哲学家是黑格尔。黑格尔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时代概念，认为所谓“现代”，便是与古代和中世纪相对的“新时代”，这个时代发生的最重大事件是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正是这些事件决定了“现代性”的根本特征。与“现代”或“新时代”这一称号同时出现的，是革命、解放、进步、发展、危机、时代精神等直到今天仍然有效的概念。哈贝马斯和黑格尔一样将“现代性”理解为一个新时代，但他认为，所谓“现代性”，是指启蒙时期以来在思想、社会、科学、文化、道德、法律等各方面出现的“自主化”倾向，即不再立足于过去、模仿过去时代的榜样，而是在对过去的批判和反思中自己创造自己的规则，制定自己的价值标准。启蒙思想家的现代性设计基于对一个民主、平等、自由的人类世界前景的憧憬，是一项在思想、社会和文化三方面展开的综合工程，包容了人类迄今创造的全部正面价值和理想，绘制了一幅关于人类社会逐步发展和完善的理性蓝图。现代化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不仅如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所说，是西方的“宿命”，也是全球的“宿命”，是理性的决定性实现。尽管启蒙运动开启的“现代性工程”由于资本主义过去200多年的发展进程出现了严重偏颇而处于停顿状态，其价值和理想直到今天尚未全面实现，但它毕竟体现了进步的逻辑，为人类的未来指明了方向——现代性仍然是一项“未竟的工程”。

在15世纪（或者12世纪）至19世纪之间，一种新的文化特征在欧洲形成，彻底改变了城市生活的形式和内容。引发这种改变的主要原因先是文艺复兴运动，再是商业资本主义、寡头政治，随后是工业革命和启蒙思想。改革家和城市设计学家由此开始面对现代城市设计这一新课题。作为早期公民社会重要力量的城市设计学家，在一开始还没有很多参与现实的城市设计和城市改造的可能，但他们不仅仅停留于梦想，而是力求与现实结合，提出许多极具合理性的城市设计理论，形成了“理想城市”思潮，间接地并且后来越来越直接地影响现实的城市发展。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弗朗西斯科·迪乔治（Francesco Di Giorgio）、安东尼奥·菲拉雷特（Antonio de Piero Averlino Filarete）、安德烈亚·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文森佐·斯卡莫奇（Vincenzo Scamozzi）等先后对城市形态及理想空间模式进行了探讨。15世纪的阿尔贝蒂研究古罗马建筑师马可·维特鲁威（Marcus Vitruvius Pollio）的《建筑十书》后写成《论建筑十书》。阿尔贝蒂认为，建筑是一门社会艺术，关系到人们的健康和福利，所以不能把建筑看作孤零零的单元，而应当考虑到其社会功能和整个城市大环境的协调。在当时工商业发达的背景下，阿尔贝蒂提出了广场的多功能化设想，认为有的广场可以作为市场使用，他还将不同类型的市场区分开来。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城市设计理论，是城市建设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迪乔治发展了罗马时期中央有圆形纪念建筑物、道路放射状的设计方案，方或圆的广场、广场上的纪念物、向四面放射的笔直的干道和整齐的街区共同构建为完整的城市三维空间。这种设计在巴洛克时期及以后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影响至今。1460—1465年间，佛罗伦萨建筑师菲拉雷特为米兰公爵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Francesco Sforza）设计城市，并以公爵的名字命名。他在1464年写的《理想城市》一书中描述了这个想象的城市，这个理想城市方案十分注重纯几何形状在聚居方式中的运用，意在寻求一种永恒和普遍性，道路、公共设施、空间组织均依几何图形规律布置，结构上完全对称，城墙呈16边形，有8个角，整个城市的形状如同一个八角星。由于15世纪提出的理想城市过于追求完美，所以在实践中只得到有限的响应。然而，建筑师们并没有放弃追求理想城市的努力，他们的努力终于在16世纪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斯卡莫奇在16世纪80年代设计出一个理想城市的方案，这个方案指出，城市与其各个部分的关系就好比人体与其四肢的关系，而街道是城市的动脉。1593年，威尼斯人根据这种设计在乌迪内（Udine）附近建造了一座防御型的卫城——新帕尔马城（Parma）。从设计图来看，是典型的放射状星型，与菲拉雷特提出

的理想城市极其相似。这座小城直到今天仍保持了最初的面貌。

16—18世纪，掀起了一场非常强劲的巴洛克城市设计运动。巴洛克（Baroque）一词出自法语，由葡萄牙语Baroco演变而来，意谓形态不圆的珍珠或奇异古怪，古典主义者用它来指称和古典及文艺复兴艺术相反的离经叛道的艺术风格。文艺复兴和古典时期的艺术首重和谐、平衡及比例，巴洛克风格反对这种平实作风，其特点是外形自由、追求动感和戏剧性、偏向富丽的装饰和强烈的色彩。巴洛克风格发生的主要原因：一是君主集权制的形成。政治上中央集权制和君主制取代教会统治，经济上出现商业资本主义和君主商业，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力集于君主一身，并以国家的形式表现。统治者和新贵为保障其穷奢极欲，要求军队和臣民绝对服从。建设社会新秩序成为城市设计最高的功能需要，因而通过集权制运作形成前所未有的城市设计和建设能力。正如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所说的那样，古代死去的人像被当作活生生的真人加以模玩，而活着的真人却变成了机器，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服从于外来的命令。¹二是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的再发现。文艺复兴对古典建筑理论的发现与整理，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纪念性建筑的发掘和测量，导致了对古典雕塑和装饰艺术的膜拜。三是分析和实证为特征的近代科学得到发展并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何与规则的形式美成为人们规划与设计生活空间的准则。简而言之，君主、新贵族的享乐和对绝对社会秩序的要求、对古典艺术的附庸风雅和对几何图案表现力的发现，使中世纪有机城市在人们的眼中成为混乱、肮脏的象征，并成为改造的对象。作为一种新的城市景观模式，巴洛克城市强调纪念性、标志性构筑物以及它们的空间位置作为城市结构和形象的主体，而不是通过建筑的序列来构成城市形象。欧洲主要首都的重建大都基于巴洛克城市模式的一些基本原理。如柏林、巴塞罗那、布达佩斯、圣彼德堡、维也纳，特别是巴黎。所谓的新城市建设，实际上都是在中世纪的城市节理上雕刻出一些新的轴线和放射线。这些轴线和放射线的尽端是纪念性构筑物和广场。在巴洛克风格的城市和建筑里，所有元素彼此之间都是不可分割的。和透视法的发明和运用相联系，巴洛克风格也追求一种流动感，以加强在观察者眼中的社会等级区别，群体的视觉效果一般服从于某个象征统治权威的建筑（教堂或者宫殿）。但在巴洛克风格城市里可谓问题众多：一方面上层社会通过巴洛克式的宏伟炫耀他们的统治，却又被巴洛克式的繁琐礼仪搞得疲惫不堪，社会风气日益堕落；另一方面则是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巴黎警察厅长在1684年备忘录中写道：“惊人的悲惨正在折磨这个城市的大多数人口。”在一些大城市里，高达1/4的人是乞丐和靠救济生活的。而经济

¹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起源、
演变和前景》，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年，第466页。

的发展和城市的拥挤带来了噩梦般的后果，房租不断上涨，居住环境日益恶化。19世纪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方案时所批评的城市问题，在18世纪的法国已经出现。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批评道，把城市的生活从属于城市的外表形式，这是典型的巴洛克思想方法。它造成的物质损失几乎与社会损失一样高昂。皮埃尔·帕特（Pierre Patte）在1765年的一本书里记述了一系列巴洛克风格的城市和建筑设计方案，这些方案是设计师们为国王设计的。他记述这些方案的同时，也阐明了他的同代人对当时城市设计的不满。他们认为应从整体而不是局部装点的角度对待城市问题。这种观点引起了关于城市功能问题如交通问题的讨论。城市由此渐渐地不再仅仅被看作是王权的象征，而被作为一个应当尽可能理性地进行安排和组织的社会结构。帕特在另一本书里继续这个话题，提出一个在他看来比较理想的城市设计指导原则和城市设计方案，主张从技术方面来解决城市问题。他提出的方案体现了巴洛克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混合，这是一个八边或六边形的城市，便于维持治安，交通方便，供水系统周密设计，污染活动被防控在郊区。巴洛克风格对后世影响深远。1893年一直持续到1908年发生在美国的“城市美化运动”（City Beautiful Movement）很大程度上就是巴洛克运动的翻版。

现代城市 and 现代城市美学的发生决不是单纯的思想或意识形态运动所决定的，其更直接的原因在经济方面。现代城市的发生在工业革命以后。工业革命以工业资本主义替代商业资本主义，以工厂取代手工作坊，因而出现大片工业区、仓库码头区和工人住宅区，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聚集，空前扩大了城市的产业和人口规模，使传统的城市空间格局和建筑尺度被打破，城市功能越来越复杂。1830年以后，新的铁路运输网形成，更是完全改变了城市的交通等基础设施组织系统，大大加剧了城市的扩大和拥挤。工厂和铁路为人类奠定良好的物质生活基础，但也使各种城市问题应运而生，如人口密集、房屋拥挤、环境恶化、交通阻塞等等。一些古老城市的文化特征则面临毁灭的命运。芒福德指出，自19世纪起，借助于矿山、工厂和铁路，城市手工业被改造为大规模的工厂生产，把有组织的城镇变为黑暗蜂房。¹狄更斯在他的小说中将这种城市称为“焦炭城”。同时，工业革命也使市民的生活方式发生极大改变，城市中酝酿产生了公民社会和公民社会思想。公民社会思想是反对专制主义和重商主义国家、捍卫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重要武器。

在公民社会框架下的城市设计变演为一种社会改造运动。一方面，沿续传统的改善城市物质形体环境的做法，通过对城市物质形体的设计和美化来改善城市面貌，并逐步发展成为现代城市设计学；另一方面，城市设计师和政治家也认识到就城市论城市的传统做法并不能解决大工业带来的问题，所

¹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起源、
演变和前景》，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年，第461页。

以开始从区域、地理、经济、社会、文化等宏观领域入手综合探讨城市总体形态特征和发展走向，并逐步演化为偏重城市二度用地形态的现代城市规划学。

18—19世纪是乌托邦城市设计者们最为活跃的时代之一。克劳德·尼古拉斯·勒杜（Claude-Nicolas Ledoux）、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约翰·西尔克·伯金海姆（Jame Silk Buckingham）是其中杰出的代表。生活于法国大革命孕育和发生时期的杰出的建筑师勒杜，1771年奉命出任法国东部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e）制盐场的监理，三年以后被委任在塞南门（Arc-et-Senans）设计建造一个新的完整的盐场。勒杜不仅设计了一组杰出建筑，事实上建设了一个以盐场为中心的绍村（La Saline de Chaux）理想城市，现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勒杜是一个理想主义色彩很浓的设计师，他在《建筑》一书中写道，每个问题都在工作范围之内：政治、道德、立法、宗教崇拜、政府。因此，他是“造物主的竞争者（Rival to the Creator）”。欧文、傅立叶则发展了托马斯·莫尔（Thomnas More）的乌托邦城市理想。欧文1825年在新拉纳克（New Lanark）实验的“新协合村”，构画了“平均、平等、自给自足”的新城。傅立叶则构想了集生产组织形式与社会组织形式于一身的“法朗吉”（Phalanges）。

“法朗吉”同时也是一种新城，中心区是食堂、商场、俱乐部、图书馆等，其一侧是工厂区，另一侧是住宅区。1849年，伯金海姆在他的论文《国家的灾祸和矫正之道》中设想了一个可容1万人、具有自治性质的社区“模型城”（Model Town）。模型城考虑了蒸汽机车交通线服务，其规划位置一般距中心城市不超过0.8公里（0.5英亩）。不过模型城带有明显的阶级歧视，其中心区规划为贵族居住区，周边为一般市民居住区。

现代城市美学完成于上述文艺复兴、巴洛克和乌托邦城市设计思想的基础之上。它吸收了上述思想中的重视人及其社会生活、刻意于城市人文形态与意象、探索城市技术机理与功能的思想精华，很大程度上回答了城市的社会性、人文性、自然性和功能性等方面的种种问题。从学术源流上可以粗略地划分为社会学派、人文学派和功能学派三大类。

社会学派以霍华德、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芒福德等为代表。

霍华德针对现代社会早期出现的城市问题，提出带有先驱性的规划思想，尤其是在城市规模、布局结构、人口密度、绿带设置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独创性的见解。霍华德在1898年出版的名著《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1902年修订再版更名为《明日的田园城市》）中提出，应该

建设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他称之为“田园城市”（Garden City）。田园城市是以绿地为空间手段解决城市卫生状况的方案，具有城市和乡村两种环境优势。田园城市方案不仅是城市设计，也是城市社会改革的标志性方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普遍地认为是现代城市设计的开端。田园城市的每个组团占地 6000 英亩（1 英亩=0.405 公顷），其中城区 1000 英亩，四周的农业用地 5000 英亩。农业用地是保留的绿带，除耕地、牧场、果园、森林外，还安排农业学院、疗养院等，农业用地永远不得改作他用。每个组团居住 3.2 万人，其中 3 万人住在城区，2000 人散居在乡间。人口超过了规定数量，即另建新城。组团的平面为圆形，半径约 1240 码（1 码=0.9144 米）。中央是一个面积约 145 英亩的公园，一般有六条主干道路从中心向外辐射。最外圈地区建设各类工厂、仓库、市场，一面对最外层的环形道路，另一面是环状的铁路支线，交通运输十分方便。为减少城市的烟尘污染，以电为动力源，垃圾用于农业。若干个组团围绕一个中心城市，构成城市组群，霍华德称之为“无贫民窟无烟尘的城市群”。中心城市的规模比组团略大，人口为 5.8 万人。组团之间用铁路联系。霍华德设想了如下一种理想城市的图景：自然之美——水清洁、无烟尘、空气清新、田野与城市相融；社会公正——无贫民窟、社会机遇平等、充分就业；城乡和谐——城市繁荣和乡村发展互动取代城乡分离。霍华德对田园城市的土地规划、财政收支、经营管理等问题也提出具体建议：所有的土地归全体居民集体所有，使用土地必须缴付租金。在土地上进行开发建设、聚居而获得的增值仍归集体所有。城市的规模必须加以限制，使每户居民都能极为方便地接近乡村自然空间。但他认为，工业和商业不能由公营垄断，要给私营企业以发展的条件。在霍华德的影响下，英国 1899 年成立了田园城市规划协会，田园城市建设运动也就此发端，并成为世界性潮流。1903 年又成立田园城市有限公司，筹措资金在距伦敦 56 公里的地方购置土地，建立了第一座田园城市——莱奇沃思（Letchworth）。1920 年在距伦敦西北约 36 公里的韦林（Welwyn）建设第二座田园城市。

格迪斯是英国著名博物学家、进化论的杰出代表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学生，他将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扩展到区域规划，并且在综合性城市学研究方面做了开创性工作。他 1905 年发表的社会学论文可以说是最早的城市社会研究成果。格迪斯最初研究生物，后来把生物学、生态学原理和方法应用于社会学研究，将公共卫生、环境保护、住宅改进、市政工程等都综合到城市社会学和城市设计学上来。田园城市理念在 20 世纪 20 年代引进美国，并且受到许多规划与建筑学家的拥戴。经由格迪斯等人的推波助澜，逐渐成为正统规划理论的基础和基本原则，并且将乌托

邦式的城市梦想落实为都市邻里单元和功能分区的规划准则。格迪斯只写了《城市发展》和《城市演化》两本书，但他在1914—1924年十年间参与了印度50座大小城市的规划工作。

芒福德师承格迪斯，给予田园城市思想很高的评价，并发展了以其为核心的区域规划理论。他认为田园城市模式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建立起有机联系，并把城市中的各种器官看作有序整体进行规划，从宏观的层面上把握城市和区域的系统性。芒福德不仅认识到城市内部各要素间的有机联系，而且强调城市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从1922年出版《乌托邦的故事》，到1931年出版《技术与文明》，到1938年出版《城市的文化》，到1961年出版《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再到1966年发表论文《城市的形式与功能》，反映了芒福德学术思想在不断深化。《城市的形式与功能》这篇论文是城市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其中指出：“如果说在过去许多世纪中，一些名都大邑，如巴比伦、罗马、雅典、巴格达、北京、巴黎和伦敦，成功地支配了各自国家的历史的话，那只是因为这些城市始终能够代表他们的民族的文化，并把其绝大部分流传给后代。”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又是这一过程中的介质和桥梁。“一个城市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与它所集中和流传的文化之规模与复杂程度有直接关系。”“人类社会的文化成就、文化积累越是广博、丰厚，就越显示出城市在组合、发挥这些文化成果中的重要作用。”对于城市的本质，芒福德指出：“城市从一开始就是控制的中心，而不是什么贸易或制造业中心。”并由此引申出：城市内与城市间的结构关系反映着社会结构关系；一个国家或地区应当而且可以建成符合社会需要的大中小城市的等级结构。¹

¹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的形式与功能》，
载《国外城市科学文
选》，贵州人民出版
社，1984年。

人文学派以卡米洛·西特（Camillo Sitte）、埃利尔·沙里宁（Eliel Saarinen）、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等为代表。

西特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著名的建筑和城市设计师，他在19世纪末首先提出，城市应当被艺术地看待，城市环境要有人文美学的内涵，城市设计必须关注人在城市环境中对美的欣赏与感受，在物质功能构成中强调人的精神功能的满足。西特在1889年出版的《城市建设艺术》一书中强调指出，中世纪城镇这个和谐一致的有机体是通过许多建筑单体恰当地相互协调而形成的。城镇应当像大自然的美景一样，使人感到赏心悦目。建造城镇时，不仅要给居民以保护，而且要给居民以快乐。为了达到后一个目的，城镇建设除了技术问题要考虑外，还要研究艺术问题。在城市空间艺术创造中，他强调自由灵活、和谐协调和有机空间围合三个方面。²西特的理论建立在现象学、实证主义哲学和建筑语言学的基础上，超越历史地预见到现代城市的形式美

²卡米洛·西特：
《城市建设艺术》，东
南大学出版社，1999
年。